

信札作为交流的主要媒介，在旧时交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们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抒发情感、交流感情、探讨学问的重要载体，既是难得的历史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遗存，浸润了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冯氏藏札》是从史学家、收藏家冯永轩先生及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中心名誉主任冯天瑜先生父子两代人集藏的信札中精选出来的一批颇具代表性的重要信札，共计 195 通 468 页，分为“近贤论艺”“湘淮谈兵”“左营密函”“花溪札丛”“新疆政书”“冯氏飞鸿”六部分，涉及军事、政治、文学、历史、语言等多个重要学科领域，历时 3 年多整理而成，内容丰富。

《冯氏藏札》收藏最早的信札为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焦循致阮亨的信札，最晚为当代学者武汉大学陈锋教授致冯天瑜先生的信函，在时间跨度上囊括了从清代中期至现当代近 300 年的历史，是当时政界、军界、教育界、艺术界等各界高层人士往还信件的综合辑，涉及各时代人物多达三四百人。其中有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重要名流探讨文艺的信札，湘军、淮军与太平军及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及将领们的军政书信、左宗棠平定新疆的密函、民国新疆政要的信札等，涉及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沈桂芬、李鸿章、曾

国荃、张之洞、左宗棠、丁日昌、李瀚章、焦循、翁方纲、张廷济、张裕钊、陈衍、樊增祥、包(鲍)尔汉、刘盼遂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现当代学者王葆心、刘盼遂、胡厚宣、黄文弼、姚雪垠、程千帆、余秋雨等人写给冯氏父子的信札。

《冯氏藏札》反映了这 300 年间的诸多历史特征，其中有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捻军作战，左宗棠平定新疆回民叛乱等重大历史题材，有反映乾嘉学风的金石、考据学问的切磋通信，也有收藏家鉴赏、书籍借阅的函件，还有反映社会动乱、宦海浮沉以及人生思考的文士生活信件。名人手迹，所议之事，无论巨细，均为当时历史之见证，是研究清史、民国史、太平天国史、捻军史、辛亥革命史及当时社会风情的重要史料佐证。

《冯氏藏札》的整理出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必将进一步丰富清代学术史、现当代学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生活史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冯氏藏札》中有不少金石家、收藏家的往来书信，颇富文献价值。如李晋年在书信中讨论碑

文史渊薮 艺术撷珍 ——读《冯氏藏札》随感

■钟书林



《冯氏藏札》
冯天瑜编
长春出版社出版

帖以及碑帖漫灭与拓本保存情况，可为金石学者提供历史文献资料。又如集金石学家、书法家、收藏家于一身的张廷济，在信函中与“金石僧”六舟上人讨论金石、墨本等收藏；集诗人、书画家和鉴赏家于一身的杨翰，在与石坞的多通书信中讨论文艺的诸多情况。其中，陈衍致献侯的多通书信谈及陈衍诗集笺注、《广雅堂骈文笺注》及刻印等；赵花溪信札 42 通 121 页，可弥补赵花溪现有稿本的不足，丰富清代文人集的

整理与编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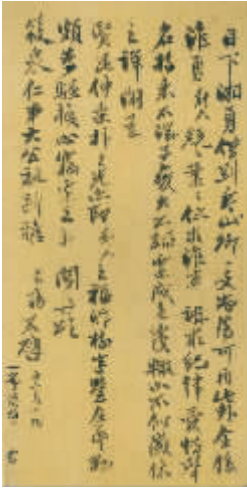
《冯氏藏札》集藏有不少文人信札，颇富文学价值。如《冯氏藏札》收录同光体代表人物陈衍书信 6 通，其中谈及陈衍诗集的笺注事宜，可以探知陈衍诗集的早期传播情形。陈衍在书信中说：“知文人注诗颇难，不如先注其出正史者，次则诸子，次则大家诗集。”不啻为古人注诗的理论与方法指导。陈衍在书信中谈及龙榆生等门人的情形，也可以为现代学术史增添不少史料。

值得关注的是，有多封书信涉及文人借贷，文辞颇有特色。如吴其昌致信时昭瀛，请求借钱款买书，文笔和婉雅致，颇富韵味；而余联沅的借债书信，读来却凄然感人，令人黯然伤神。所有这些，从侧面反映了一代文人的生活画面，是研究文人生活史的宝贵资料。

《冯氏藏札》由仅有公教薪水收入的学者在长达半个世纪间，孜孜不倦地访辑，节衣缩食地购置，终于集腋成裘，反映了冯氏一门两代学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挚爱的拳拳之心，其清贫而炽热的坚守，常令人感动。“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众材成



翁方纲致某书信



曾国藩致幼泉书信

构”，冯氏父子采摭群珍，公诸同好，付之梨枣，传于不朽，嘉惠士林，功莫大焉。

文学史写作的叙事危机

——评乔国强的《叙说的文学史》

■曾军

乔国强的《叙说的文学史》是一部以叙事学的方法来反思文学史写作的专著。从外表上看，这是一本有关文学史叙事研究基本理论的著作。乔国强将文学史写作视为一种叙事行为，以此来揭示文学史写作者、叙述者、文学史研究对象以及文学史读者之间的“叙述关系”，并由此初步建构出“文学史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但从深层来看，这本书其实是乔国强对中外文学史写作困境与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对文学史作为一种叙事行为的这一人为建构性、虚构性的强调，揭示出文学史写作追求的“客观、中立”的科学性的困境，呈现出文学史写作的叙事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这本书“从里到外”翻过来，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论辩性”来透视《叙说的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的缘起，是针对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和写作中出现的文学史观念偏差而展开的。在乔国强看来，如果没有一个正确、恰当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重写难以走得太远。有鉴于此，乔国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西方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 90 年代以来围绕文学史写作所展开的各种反思，就毕晓普、霍华德·M·琼斯、J·M·卡梅伦、理查德·H·富格、詹姆斯、杰兹·派尔克、克里斯蒂·V·麦柯唐纳、格里高利·S·杰依、拉尔夫·科恩、约翰·弗洛、韦勒克、杰罗米·麦克伽恩、戴维·珀金斯、温戴尔·V·哈里斯、瓦尔特·F·维特等众多学者的文学史写作



《叙说的文学史》
乔国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理论展开思考。其中尤其对韦勒克的文学史观展开了全面的梳理。文学史是否不如文学本身重要？文学史是否需要从具体的事物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如何面对文学史的神神秘化问题？文学史是从里向外的阐释的吗？“撰写文学史即撰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可能吗？”以至于最近的“星球文学史”这一致力于描述文学全球化的新概念等等，都一一接受了乔国强的认真梳理和细致辨析。在他看来，尽管上述思考颇多新意，但大多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而较少进入“文学史写作的内部构架、文学史叙述的性质与特点”的

讨论。由此可见，乔国强看重的既不是中国“重写文学史”逻辑基点的缺失，也不是西方“文学史”反思的形而上虚蹈，而是将“文学史写作”还原为一种叙事行为，将之置于述体、时空、伦理、世界等多个维度来重新审视。

从第二章起，《叙说的文学史》便以“文学史叙事”的理论命题为架构，以中外经典文学史写作为个案，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如在“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和伦理”一章中，乔国强重点解剖的是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分析的是“王瑶不言说的身体是如何影响、决定作为史学家言说的王瑶及其所撰写的文学史文本的形态的”，由此揭示出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处于“三种述体”中的王瑶自身所处时代、环境与学术自觉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在文学史观和价值追求的自觉与个人的艺术感受和文学趣味之间的冲突。通过这一个案，乔国强指出，“文学史述体时空的伦理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伦理关系，其相关的规约也是一种具有深刻时代印记的规约。”再比如在“‘秩序’的叙事新解”中，乔国强以顾彬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分析了其历史分期三段论中的“时空错误”，指出“顾彬为我们所构建出来的第二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政治时空，是一个不对称的文化政治时空”，并由此引发出文学史写作“秩序”[即叙事学中的“时序”(order)一词]中“连接”“嵌入”与“省略”。基于此讨论，乔国强

认为：“文学史叙事不存在无意义的秩序安排。秩序是作者安排的秩序，是代表作者心目中的文学时空和观念中的文学历史。”因此，通过这些“文学史叙事策略”的分析，可以展开对文学写作者以及文学史观念的深刻分析。再比如，在“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中，乔国强以“症候式阅读”的方式发现，截至 2000 年，共出版了 307 部“大屠杀文学”作品，但几乎没有任何一部被以“大屠杀文学”的名义选入文学史并获得评价。由此，何以缄默便成为追问美国文学史写作的重要视角。

乔国强的这一“文学史叙事分析”的努力，让人联想起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对“科学”和“叙事”的解构，该书认为知识是一种语言现象，包含着话语主体的权力关系，有着语言游戏的性质；知识更是一种叙述行为，具有知识合法化的功能。因此，一旦出现了叙事危机，知识的合法性也就出了问题。这也正是利奥塔将“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的重要原因。乔国强将文学史写作视为一种叙事行为，就意味着文学史所追求的“真实”只是文学史写作者的一种“虚构”；整个文学史写作必然受到“叙事危机”的深刻影响。

那么，克服文学史写作的叙事危机是否可能？答案是可能的。但克服危机的前提是正视这一文学史写作的叙事危机，认识到文学史写作者作为“述体”所要受到的从观念到社会再到身体的多重限制，还要认识到文学史写作中“秩序”的安排所可能产生的文学史效果，更要认识到文学史处于“虚构世界”“真实世界”和“交叉世界”三重世界之间所能够展开的“可能世界”。因此，只有拥有了文学史写作的叙事自觉，才有可能增强对文学史写作观念和写作策略的反思，才有可能克服文学史写作的叙事危机。